目　　录

德阳县畜牧业发展概况……刘乾刚（1）

革命青年的摇兰——记国立六中四分校……魏绍桓（16）

出川抗日亲历记……李　辉（21）

冯玉祥将军在德阳二、三事

……曾吉祥口述　曾孔明整理（32）

刘庆恩事略……刘述云供稿　王朝华整理（33）

怀念郭老——敬宇……刘述云（38）

金山红灯教始末……邱子明（40）

民国时期德阳县的手工业……肖朝齐（46）

接管德阳自卫总队……李　辉（55）

李调元和弹戏及弹戏班子……米贞海（60）

罗真观……刘仁铸（62）

罗江东门大桥……刘期文（64）

附德阳市市中区文史资料征稿目录……（67）

德阳畜牧业发展概况

刘 乾 刚

畜牧业是饲养繁育猪、牛、羊、马、兔等家畜和鸡、鸭、鹅、等家禽的一种生产事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畜牧业的兴衰与人民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历史上，畜牧业在五业中所占比重仅次于农业，展望未来，无论从数量、质量、产值增长速度，它都将处于领先地位。我县畜牧业发展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起步的？三十多年来发展如何？现就有关资料作个概况介绍。

一、 历 史 的 回 顾

民国时期，据县府概况记载，“本县系农村社会，人民均以农耕为主，县境内无适宜牧场水草，鸡、豚、牛、羊多在自有家庭饲养；目的在造产耕地肥料及销售食用，并无以畜牧为主要业务者，仅为家庭付业而已”。说明农民以种植业为主，自给性生产居多，为耕耙而养牛，为肥料而养猪，没有以养殖为主的农户，饲养管理畜禽方法落后，商品率低。各种畜禽中以猪饲养量最大，户养十余头的少，一、二头的多。据民国三十年(1941年)罗江县府调查记述：“全县32287户、153724人，养猪28252头，（人平养猪0.18头），当年屠宰13199头”，人均占有肉不过十斤。德阳县府调查记述：“全县36100户，166000人，养猪29890头，（人平养猪0.18头），当年屠宰17934头”，人均占有肉十余斤。

德阳、罗江两县是1949年12月22日（民国三十八年冬月

初三)解放的，当时两县共有猪61973头，能繁殖母猪3594头，耕牛19765头，其中：黄牛12900头，水牛6865头，能繁殖的黄母牛683头，水母牛295头。马90头，骡222头，驴164头，山羊1680头，兔22227头，鸡288308支，鸭148298支，鹅1337支，蜂532群，有孵抱房六家，年孵量70--90万支，无奶牛，仅有用畜挤奶卖的本地黄母牛二头。以上这些数据就是民国时期畜牧业发展的一个终结，也是建国后畜牧业发展的一个起步点。

二、建国后的发展

1．养猪：猪具有多生、快长、早熟的特性，又是农村有机肥的主要来源，因而历史上即形成为农村养殖业的重点。建国后，我县生猪发展虽受到过一些不利因素影响，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经历了保护--发展--下降—恢复—徘徊—再发展的过程。

1950年1月原德阳、罗江两县人民政府接管建设科时，科内无畜牧兽医专职人员，全科仅六、七人，安排一名科员兼管兽防工作，时值建国初期，猪、牛疫病流行严重，1951年1月经川西兽疫防治所培训兽防人员，后派来县组织防疫队伍，重点对猪的三大主要传染病(猪瘟、猪肺疫、猪丹毒)进行普遍预防注射，基本控制了疫病蔓延，对恢复国民经济，保护生猪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五十年代初，中央提出“私有私养公助，自繁自养”的养猪方针，人民政府先后制订了一系列保护猪源，促进生猪发展的政策，由国家发放猪贷款，扶持贫困户养猪。罗江县一九五一年关于春耕生产工作指示中就明确规定：“严禁宰杀一百斤以下的幼猪，奖励繁殖，加强兽疫预防注射”。培训兽防人员，组织防疫队伍，仅三年时间，存栏数就由1950年的68207头，增加到116886头，增

长71.36%。由于政策对路，养猪事业一直持续发展，1957年生猪存栏数达到127480头，较1950年增长0.87倍。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中央提出："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方针后，省委提出了："公有公养为主，生产队和公共食堂集体饲养为主，机关团体自繁自养为主。"的三主方针，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中刮起了"平调风"和"共产风"，社员私养猪全部折价入社，收为集体饲养，生产队、管区、公社大办百、千、万头猪场，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饲养管理粗放，三类猪日渐增多，死亡严重，仅德阳1958年1月至11月就死猪22240头，大大挫伤了发展养猪业的积极性，虽采取了给猪打牛奶针、蛋清针、铁丝针、割甲状腺等快速催肥方法，建立了"仔猪哺育园"，"母猪营养院"，推行所谓"母猪全配满怀"，"见母就留，有母必配"等运动，但因其违反科学，仍未能制止生猪下降。1960年底，生猪存栏数仅96119头，当年出栏率11.5%，人平占有肉0.62斤，成为历史上的极衰期。

1961年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提出："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两条腿走路的养猪方针，强调发展养猪必须坚持自繁自养，彻底清退"平调"，同时县委成立了"生猪生产办公室"，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发动群众，认真解决饲料问题，建立健全养猪责任制和奖惩制，为了扩大猪源，提高仔猪成活率，省委在(62)10号文件中规定，对饲养种猪户实行奖励，并划给饲料地1.5—2分，根据省委文件精神，县委作了"每出生并成活一头仔猪奖售粮食五斤，黄豆一斤，如出售再奖售粮食二斤

半”的规定，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只有鳏、寡、孤、独才喂种猪的封建迷信状况，提高了种猪饲养户的社会地位，调动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全县养猪出现了好势头，1962年生猪死亡率比1960年减少10%以上，全县平均每户养猪2.2头。

1966年春“文革”开始，大批所谓资本主义，把合理的奖惩制度视为搞物质刺激及管、卡、压，统统予以取缔，养猪业遭受冲击处于徘徊的境地，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后，提出“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的方针，要求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强调掌握猪源，猪权。1971年存栏数达到403142头，然而源于历史观念，生猪被视为生产资料，养猪是作为积肥的措施，故存栏虽多，商品率是低的，当年出栏率仅38.5%。1979年后又把养猪方针变为“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积极发展集体养猪”，贯彻后生猪有所上升，但公有公养猪降到了最低点66771头，仅占总存栏数的14.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央关于改革，搞活农村经济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养猪业发展很快。1979年国家提高了肥猪收购价格，平均提价25%，实行出肥奖售粮，使农民在经济收入和粮食上得到了实惠，加之连年粮食增产，初级配合饲料，生猪经济杂交，仔猪补饲及“一根笋”快速育肥等先进饲养管理方法的推广，养猪专业户、重点户逐年增多，1983年有出栏肥猪十头以上的259户，1984年增加到1489户，同时出现了年出肥猪百头以上的养猪大户二户，使养猪业向专业化、商品化逐步迈进。

我县生猪品种多属成华猪过渡型，全身被毛黑色，一种是大耳狗头型，群众称为“大种猪”，一种是小耳方头型，

群为众称“上坝猪”，肥育性能中等，平均日增重0.44斤，屠宰率为74%。建国后，除了着手对本地猪种提纯复壮外，并引进了外地良种。1956年引进内江猪，1958年引进荣昌猪。1964年引进约克夏猪，巴克夏猪。1971年引进兰德瑞斯猪（长白猪），上海白猪，北京黑猪。1974年引进成华猪。1983及1984年先后二次引进杜洛克猪。为了扩大良种推广面1958年始建生猪人工授精站，1973作了种猪血缘调查，开展了以猪一、五号病为重点的疫病普查。1978年开展了全县种猪普查鉴定。畜禽疫病普查。畜禽寄生虫病普查。在饲料生产、调制、加工方面，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推广青贮饲料，土制金霉素饲料，发酵饲料，碱化饲料，盐水发酵和空气发酵饲料，黄曲霉糖化饲料，“中曲”，“纤曲”发酵饲料，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推广水花生、水浮萍、水白菜、水葫芦、水芹菜、聚合草、黄花苜蓿、黑麦草、白三叶、初级配合饲料、畜禽饲料添加剂等。

以1949年为基础，通观三十五年养猪发展历史，生猪年末圈存数，1949年61973头，1953年突破十万，1964年突破二十万，1966年突破三十万，1971年突破四十万。1979年末圈存生猪473410头，是我县的历史最高水平。1949年生猪数与1984年生猪460554头相比，增长6.43倍。生猪出栏数，1949年30320头，1964年突破十万，1980年突破二十万，1983年突破三十万，当年出栏310000头，创历史最高水平。1949年生猪出栏数与1984年出栏309058头相比，增长9.19倍。人均占有猪肉1949年8斤，1957年15.3斤，1966年24.3斤，1980年37.5斤，1981年44.7斤，1984年68.7斤，创历史最高水平。1949年人均占有猪肉量与1984年68.7斤相比，增长7.58倍。

2．养牛：长期以来，牛是被当作生产资料而受到重视，1949年至1984年的三十五间，虽几经曲折，但终归还是向前发展的，1949年全县有牛19765头，其中能劳牛13840头，当时农村普遍缺牛力，耕耙进展迟缓，违误农时。1950年从中央到省、地、县都先后分别发布“繁殖、保护和严禁宰杀耕牛”的命令，当时宰杀一头老、病、残牛都必须办理淘汰证，还要锯角留齿以资验证，否则受到严惩。同时发放贷款，提倡自由借贷，以购买耕牛保证按时耕种。1954年开始先后将耕牛折价入社归集体所有，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很重视耕牛的发展，采取“自繁自养”和筹集资金买牛两种方式增殖牛支，从1954年至1957年，四年内共繁殖幼牛4619头，购买耕牛9559头，使耕牛总数达到28612头，比1949年的19765头，增长44.76%。

1958年全县实现“公社化”，后受“共产风”的影响，将耕牛集中饲养，由于管理不善，饲养不当，草料不足，加之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耕牛由管区统一调用，有的社队盲目深耕，昼夜使役，劳役过度，造成耕牛不断死亡。1958年至1961年共死耕牛7701头，其中1958年就死牛3162头，到1961年全区耕牛存栏数下降到25743头，同1957年的28612头相比，减少10.3%。

1962年至1971年这段时期，执行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耕牛下放到生产队，1962年8月，德阳县人委在(62)人办字第205号“关于作好耕牛繁殖配种和饲养管理的意见”的文件中提出：“饲养员民主选举，长期固定包养，规定耕牛使用年限，超过使用年限后，折价提成奖励，尽可能采用“养用合

一”或“养用结合”的办法，对饲养员、使役员推行“五包”、“四定”、“一奖赔”的责任制和订立爱护耕牛的公约，并保障生产队对耕牛的自主权和允许社员喂一部份小牛和母牛”。1963年9月，德阳县委发出“每队每年至少繁殖一头牛的决定，在三、五年内实现耕牛基本自给，改变缺牛面貌”。1965年7月县委为了深入贯彻“自繁自养”的方针，调动广大社员繁殖耕牛的积极性，组织工作组以二十多天时间，对罗江公社执行奖励繁殖耕牛的政策进行了调查，召开了干部、饲养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政策兑现会，将未折价的八十六头幼牛全部折价奖励兑现，并将原折价偏低的进行了纠正，在点的带动下，全县每个公社都搞了一个大队的政策兑现样板，促进了饲养繁殖耕牛的积极性。1965年上半年全县无母牛的生产队436个，占生产队总数的14.6%，缺母牛870头，下半年无母牛的生产队下降到275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全年产小牛2900头。在此期内，耕牛配种繁殖工作成效卓著，1971年耕牛存栏数达32671头，创历史最高水平。

1972年在“堵死资本主义的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左倾思想束缚下，对奖励繁殖耕牛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批判“唯生产力论”、“管、卡、压”、“物质刺激”的严重影响下，放松了对发展耕牛的领导，繁殖耕牛的奖励政策，饲养管理制度，不能很好贯彻执行，加之强调农业机械化，对机牛结合的方针认识不足，部分社员走向了“养牛不如买机”的极端，忽视了耕牛的重要性，1972年后耕牛逐年下降，1977年降至23685头，比1971年的32671头减少27.50%。

1978年至1984年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随着拨乱反

正，纠正左的政策，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尽快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政策。我县1982年组织人员，将饲养耕牛的现行集体所有，专人使役，折价到组，固定专人使役，折价到联户和到户等四种类型的责任制进行了调查研究，认识到要使耕牛尽快恢复起来，在发展养牛业上打开新局面，必须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将耕牛折价到户饲养，事实证明耕牛折价到户，养牛业走上了新路，1982年配种西门答尔杂交黄牛，摩拉杂交水牛共1604头，使我县耕牛不但有了量的变化而且有了质的变化，向役、肉、乳兼用型发展，同时涌现出了一批养牛专业户，如通江乡龙洞村二组农民彭介寿养牛三头，年平人均收入116元，和兴乡二村八组农民肖开生养牛二头，年平人均收入110元。1981年至1984年四年内共繁殖幼牛6164头，1984年耕牛总数达30436头，比1949年的19765头，增长0.54倍。

我县耕牛长期不能自给，从1962年至1978年十七年间共购进耕牛21973头，平均每年购进1292头，购买地区有远自省外，河南信阳，广西柳州，省内有达县、宜宾、西昌、江津、涪陵、南充、雅安、绵阳、渡口等地区的县市，耕牛来源复杂，买回的牛多数不老就小，属壮年的不多，因而每年淘汰更新数量大，资金外流严重。

对耕牛的品种改良着手较早，原罗江县1956年建立耕牛人工授精站，原德阳县1958年建立了耕牛人工授精站。1956年引进秦川牛，1958年引进宣汉、荣经黄牛，涪陵、德昌水牛、荷兰牛、爱尔夏牛，1978年引进摩拉水牛、西门答尔牛、海福特牛、利本赞牛的冻精，截至1984年全县有耕牛冻精配种点八个，1984年配种耕牛736头（其中水牛286头，黄牛450头），

受孕率为67.93%。

德阳解放前没有奶牛。民国八年(1919年)英国传教士汉明登在德阳要吃牛奶，都只好买当地产仔后的黄母牛来挤奶。建国后1952年从绵阳第一次买回一头黑白花小奶牛，1957年才产奶。1958年至1963年德阳饮食总店养有黑白花奶牛十七头。县园艺场1960年向该店购奶牛一头，年产奶万余斤。1964年又将其十七头牛全买了。1966年又购二重厂黑白花奶牛四十头，1970年购成都军区奶牛二十头，1979年购雅安农学院奶牛二十四头。奶牛由1960年的一头，发展到1984年的271头，年产奶由一万余斤上升到112.5万斤。1984年由县各方集资在福建省仙游县购回奶牛74头，1985年又购回61头，这些奶牛多分散在市郊农村专业户经营，全县奶牛到1984年已发展达375头。县园艺场1976年前养有种公牛一头，自行采精配种，以后改由向成都购买冻精配种。现有奶牛271头，产奶牛169头，占62.36%，平均每头年产奶6656.8斤。

3．养羊及马、骡、驴：羊的品种属本地山羊，1950年引进成都麻羊，1981年5月引进陕西省富平县杂交奶山羊八十七头，放养于东河、天元、城区、双东等乡，因适应性差，多数死亡。1949年全县有山羊1680头，1657年发展到16157头，1662年达到42099头，比1949年增长24倍，创我县山羊存栏数最高历史水平。自1992年后即逐年下降，1976年仅存247头，近年略有上升，但数量不大，截至1984年底也仅有515头，比1949年减少69.3%。我县气候、环境不适应绵羊，但历史上仍有饲养者，最低年分1965年有4头，最高年分1971年达105头，现在已无饲养者。山羊发展中的起落原因，一是1958年前尚未限养、禁养。二是1969年困难时期过后，积极恢复生产，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家中有支羊，当

得开个小银行”，因而养羊的积极性大增。以后年分由于山羊与发展林木、竹、树的矛盾，有的社队规定山羊啃咬树苗处以罚款等，由限养而禁养，以后虽提倡圈养山羊，但都不习惯，加之养羊经济收益不大，致使山羊逐年减少。

马、骡、驴我县历来无繁殖习惯，多从西昌、陕西、甘肃一带购入，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罗江县有马、骡、驴共956头，德阳县有马465头，骡512头，驴150头。当时由于交通不便，多用作运输，驮用、挽用者多，乘用者少。到1949年则大为减少，两县仅存马90头，骡222头，驴164头。建国后，马，最高年分1961年达到444头。骡，最高年分1957年达到141头。驴，最高年分1960年达到32头。截至1984年全县有马393头，骡9头，驴9头。多数用着拉架架车。

4．养禽：我县养禽以鸡、鸭为主，鹅次之。鸡的品种多为本地种，成年体重1.74公斤，母鸡开始产蛋为233天，体重1.45公斤，年产蛋最高111个，最低63.8个，抱性好，耐粗食，觅食力强。1950年引进来航鸡、澳州黑鸡、芦花鸡、吐绶鸡等，至今数量已不多。1960年引进白洛克，1970年引进新汉夏鸡、洛岛红鸡、红育鸡，1983年引进京Ⅰ系、京Ⅲ系、罗斯鸡、科尼斯鸡、农大黄鸡等。1949年全县养鸡238308支，1951年突破三十万，1956年突破四十万，1979年突破五十万，1982年突破六十万，1983年突破百万，达1047817支。创历史最高水平，比1949年增长2.63倍。

养鸭在我县历史悠久，主要是肉用仔鸭(菜鸭)，数量大，产品多，其次是蛋鸭。是全国养鸭最发达的县之一，以放牧为主要饲养方式，充分利用广阔的水稻田、水渠、堰塘、水库为牧地，以散落在田中的稻谷和水生动植物为饲料，补

饲粮较少，这种饲养方式的突出优点是用粮省、成本低、见效快、商品率高。“鸭棚子”是这种饲养方式的典型代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各地迅速发展了小群养鸭，（农民叫“囤囤鸭”或“沱沱鸭”）还是以放牧为主，补饲为辅。

解放前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47年，当时全县有孵房九户，以孵鸭为主，掌握老鸭27000余支，有棚户300多户，实际上蛋的百余户，其余仍是出售菜蛋，全年生产小鸭120万支，1549年有孵房七户，掌握老鸭二万余支，全年产小鸭百余万支。三十多年来在发展中虽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技术上前进，产量上升。1981年全县有孵房二十三个，由过去孵鸭为主，逐步走向鸡、鸭、鹅、鹌鹑均孵，由过去只能火孵逐步走向电孵、水孵等，年孵幼禽499.07万支，（其中幼鸭340万支，占68.1%），与1949年相比，增长3.99倍，是我县历史上幼禽生产量最高的一年。每年所产雏鸭远销新疆、陕西、河南、云南等省，菜鸭多就近销往成都、什邡等市县。

鸭的品种以本地麻鸭为主，1950年引进建昌鸭，至今已不多见，1971年引进江苏麻鸭、北京鸭，成年体重1.6—2.2公斤，年产蛋140个左右，蛋重60—65克。

养鹅一般都喜爱，但数量不大，本地鹅的品种有纯白和铁灰两种羽色，成年体重4—7公斤，年产蛋70—80个，蛋重125克。1972年引进广东狮头鹅，成年体重7—10公斤，年产蛋50—60个，蛋重150克左右。1949年全县有鹅1337支，1957年发展到12000支，1982年增至31060支，1984年达到84087支，比1949年增长61.89倍。

5．养兔：我县养兔具有传统习惯，因投资小，占地少，饲养来源广，销售市场宽，农民都喜欢养。建国初期兔种多

为本地白兔，五十年代开始引进青紫兰兔，是一种皮肉兼用型种，适应性好，农民喜养。1973年3月在上海市郊区引进安哥拉兔，这是一种毛用兔，现已不多见，10月又引进大耳白兔，这是一种皮肉兼用型兔，很受农民欢迎。1983年引进肉用型的加利福尼亚兔、比利时兔、丹麦白兔。1984年已向专业户提供良种兔48支，现正逐步繁殖推广。

家兔及其产品用途极其广泛，在改善人民生活加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1949年我县家兔商品量仅15600支，1957年即达168601支，比1949年增长9.8倍。从商品量来看，1957年过十万支，1978年过30万支，1984存是建国后商品量最高的一年，达464200支。从饲养量来看，1949年仅22227支，1980年过十万，1983年是建国后饲养量最高的一年达460206支，与1949年除年相比，增长20倍，后因受价格、销路等因素的影响，1984至258732支。

6．养蜂：县境内气候温和，蜜源丰富，历来即有土法饲养中蜂的传统。1979年开展了全县蜜源普查工作，全县可供放蜂的蜜源达十九种，共230672亩，绝大部分是小春作物，花期从二月开始，四月中旬结束，集中盛花期为三月份，重点又是油菜，自八十年代以来逐年扩大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十万亩以上，占蜜源总面积的48.97%，近几年果树发展较快，全县有果树195万余株，折合面积31695亩，占蜜源总面积13.5%。其次尚有开花的灌木一种，乔木六种，共89万余株，（灌木只算面积，未计株数），折合面积45030亩，占蜜源总数的19.8%。

在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下达后，我县

养蜂业发展较快，1949年仅有532群中蜂，1979年发展到7572群(其中：意蜂6057群、中蜂1515群)，增长13.2倍，平均每群单产蜜69斤，中蜂产量较低，每群年产蜜四十斤左右，意蜂平均为八十斤。每年还要接待外地来我县放养的蜜蜂，1978年接待了十个省市的四十多个县社的9200多群蜂，1979年接待了十二个省市的六十多个县社的13000多群蜂，为提高我县蜂蜜产量，促进农业增产起到良好作用。为使我县养蜂技术水平提高，1683年举办了全县养蜂专业户训练班，专门聘请省养蜂学会的专家来传授技术。1983年全县养蜂专业户有121户，养蜂2631群。

总的看来，我县养蜂历史上未过万群，最高年分为1981年，养蜂8683群，收购蜂蜜最高年分是1984年9666市担。养蜂从1981年后是逐渐下降的趋势，1984年全县5859群。

三、畜禽产品的产量与产值

建国后，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禽产品的产量与产值都有大幅度增长，1982年全县出栏肥猪290000头，产肉3194万斤，人平占有46斤，高于全国29斤和全省33斤的水平，人平消费家禽2.7斤，禽蛋6斤。1984年出栏肥猪309000头，产肉3891万斤，人平占有68.7斤，产肉量比1949年的315万斤，增长11.35倍，其它各类畜禽产品都有较大增长。如表1

畜牧业产值1966年达到1925万元，比1949年增长1.22倍，1983年达到4175.5万元，比1966年增长1.17倍，1984年达到4559万元，人平八十二元，占1984年农业总产值26046万元的17.5%，比1949年牧业产值868万元，净增3691万元，增长4.25倍。三十多年来牧业产值虽有较大增加，但在农业总产

值中的比重还是不大，据十三年的资料表明一直未突破20%，最高的1931年也仅达到19.35%。如表2

表1　　主要畜禽产品量统计表

品名 / 年度	猪肉 万斤	牛肉 万斤	羊肉 万斤	禽蛋 万斤	菜兔 万支	菜鸡 万支	菜鸭 万支	菜鹅 万支	牛奶 万斤	蜂蜜 市担
1949	315				1.56					
1957	764			203.2	16.86	10.45	48.0	0.6		
1966	1680			295.4	3.7	16.73	130.0	0.85		
1976	1707			280.5	10.88	16.47	40.2	0.66	51.0	1022
1980	2625	18.2	0.2	407.0	18.74	18.87	43.0	1.81	64.48	4371
1981	3612	27.5	1.0	395.0	64.30	24.72	67.3	2.41	71.03	7013
1982	3194	16.0	1.0	556.0	22.22	27.50	29.6	1.55	98.83	6159
1983	3367	19.0	1.0	817.27	23.39				110.14	8713
1984	3891	26.4	0.8	810.6	46.42				126.80	9666

我县牧业生产结构，是以猪为生产重点，历史上生猪产值占牧业总产值的60%以上，如1957年牧业产值1028万元，其中生猪产值639万元，占62.15%，1966年牧业产值1925万元，其中生猪产值1261万元，占65.5%，1982年牧业产值3557万元，其中生猪产值2691万元，占75.7%，这种牧业生产结构，除因传统习惯外，也与农业生产水平，饲料生产水平，生活消费水平有关。今后，随着农业及牧业生产结构的调整，畜禽全价饲料工业化生产水平的提高，人民食品结构的不断改善，肉、蛋、奶的生产比例当按需求重新调整，使畜牧业内部生产结构日趋合理，促进其全面发展。

表 2　　农、牧业产值表　　单位：万元

项目 \ 年度	1949	1957	1958	1960	1961	1962	1966	1969	1970	1976	1980	1982	1983	1984
农业总产值	5238	9148	9326	6439	5621	7363	10786	11910	12486	12934	19175	21011	23315	26046
牧业产值	868	1028	1047	293	315	732	1925	1669	1650	2121	2823	3557	4105	4559
牧业占农业总产值%	16.57	11.24	11.23	4.55	5.60	9.94	17.85	14.01	13.21	16.40	14.72	16.93	17.60	17.50

（均按1980年不变价计）

革命青年的摇篮（初稿）

——原国立六中罗江四分校纪略

魏 绍 桓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后，随即爆发了全民抗战，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同年冬，日军南侵，山东告急，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令省属各中等学校向鲁南临沂、河南许昌等地集中，听候安排。于是山东省内数千名中等学校（含师范）师生便开始了历时年余，途程长达六千余里的徒步流亡生活。大批流亡师生到达湖北郧阳、均县后，成立了国立湖北中学及其分校，但有名无实，只不过山东流亡师生的临时收容所罢了。

湖北中学在郧阳、均县立脚未稳，又于一九三八年冬辗转来川，一九三九年初到达四川绵阳，始成立国立第六中学。本部设绵阳（高中部）下辖梓潼（一分校，师范部）、德阳（二分校）新店子（三分校）、罗江（四分校）等四个分校，学生总数约三千余人。至此，流亡生活告一段落，算是有了几所真正的、正式的学校。

以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为主体的数百名师生在校长孙维岳（东生）先生和该校国文教员、现代著名进步作家李广田同志等的率领下，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廿三日下午二时到达绵阳校本部，一月廿六日暮色苍茫中到达罗江，至此，始有国立六中四分校之名称，该校师生从东海之滨到鹿头山下。历时年余，跋涉数千里，备尝艰辛，但在流亡途中（河南赊旗镇）仍成